



HELI FAZHAN YU LIXING  
DE CHONGJIAN

# 合理发展与理性的 重建

吴惠红 著

# 合理发展与理性的重建

吴惠红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 内容提要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社会发展合理性问题成为发展的核心问题。本书在分析合理性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密切关注人类自身的现实问题,特别注意结合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问题,探讨合理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理性与非理性,如何通过理性与非理性的合理把握,推进社会的合理发展。本书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合理发展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责任编辑:赵 军 毛淑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合理发展与理性的重建/吴惠红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130-0146-5

I. ①合… II. ①吴… III. ①合理化-研究 IV. ①B0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2512 号

## 合理发展与理性的重建

HELI FAZHAN YU LIXING

吴惠红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http://www.ipph.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339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开 本:787mm×960mm 1/32

版 次: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字 数:241 千字

ISBN 978-7-5130-0146-5/B·002(3084)

邮 编:100088

邮 箱:[hjb@cnipr.com](mailto:h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0860 转 8240

责编邮箱:[maoshujuan@cnipr.com](mailto:maoshujuan@cnipr.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9.625

印 次: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绪 论                   | 1   |
| 第一节 发展合理性问题的缘起            | 4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11  |
| 第三节 课题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 27  |
| 第二章 合理发展的评价与表现            | 40  |
| 第一节 合理发展的评价维度             | 40  |
| 第二节 合理发展的评价尺度             | 47  |
| 第三节 合理发展的具体表现             | 83  |
| 第四节 合理发展的人文价值导向           | 95  |
| 第三章 合理发展与理性               | 102 |
| 第一节 理性因素的界定               | 102 |
| 第二节 理性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 123 |
| 第三节 合理发展需要合理的理性指导         | 140 |
| 第四章 合理发展与非理性              | 148 |
| 第一节 非理性因素的界定              | 148 |
| 第二节 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 167 |
| 第三节 合理发展离不开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 188 |
| 第五章 理性与非理性的合理把握           | 206 |
| 第一节 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             | 207 |
| 第二节 理性与非理性的交互作用           | 223 |
| 第三节 以理性为主导,合理规范和引导非理因素的发展 | 241 |
| 第六章 社会发展过程中理性的重建          | 258 |

|      |                |     |
|------|----------------|-----|
| 第一节  | 理性重建的必要性·····  | 258 |
| 第二节  | 理性重建的可能性·····  | 282 |
| 第三节  | 理性重建的路径探索····· | 287 |
| 参考文献 | ·····          | 296 |
| 后 记  | ·····          | 302 |

# 第一章 绪 论

自马克思·韦伯以来，合理性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社会发展合理性问题被凸显出来并逐渐成为发展的核心问题。这是因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两大主题，各个国家与民族千方百计地谋求发展，但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在取得不断进步的同时，也面临各种矛盾和困境，诸如人与自然关系不断恶化，世界范围内发展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人类的生存空间惨遭破坏等，这些矛盾与困境已成为人与社会良性发展的巨大障碍，更是未来人类良好发展的巨大敌人。这不得不让人反思：社会发展不仅是快与慢，还涉及好与坏；不仅是怎样发展，还关乎为谁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发展合理性问题就凸显出来，并已逐渐成为发展的核心问题。其实质是如何对待理性以及非理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人类曾经有过从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的经历。近代，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理性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近代科学的成功运用，使人们相信：人的伟大与崇高在于人有理性、有知识、有逻辑思维，人们凭借理性和科学就可以认识自然，从而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并成为自然的主宰。理性主义者盲目崇拜理性，认为理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把科学理性看做一切合理性的典范，忽略了理性得以实现的社会历史条件。随着人类这种理性的张扬、社会物质财富的丰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前景出现了阴霾：一方面，生态失衡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能源短缺问题、不可再生资源问题等，这些所谓的“全球性问题”严重地阻碍和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机器技

术的发展和生产制度的建立，工业文明把人束缚在机器系统孤零零的断片上，每一个个体都必须按照机器设备来铸造自己的躯体和灵魂，忧虑、沮丧、孤独和冷漠弥漫社会，生活失去光彩，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式微。这让许多哲学家与思想家不得不进行反思：人固然应当超越非理性而达到理性，但如果仅仅注重理性而忽视非理性，则理性不免趋向于抽象化，人本身也成为片面的存在。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哲学家又走向了理性主义的反面：非理性主义。为了克服传统理性主义只注重理性、把理性绝对化、片面性的弊端，非理性主义各流派都把传统理性主义所漠视的非理性提到首要地位，认为理性只是人精神生活的极小部分，只代表精神生活的外表，而非理性则是人精神生活的极大部分，具有极强的内驱力，决定和支配人的一切。非理性主义贬低人的理性，把非理性（如叔本华的“求生意志”、尼采的“权力意志”、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和萨特的“主观自由”等）推向哲学研究的最前沿，并由此上升到对人性的哲学意义的探讨。非理性主义看到了理性主义发展观给现代社会、个人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如异化劳动、道德沦丧、人文精神的丧失，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等，在认识论中，非理性主义张扬非理性因素，其合理性主要在于揭示了认识能动性的根源，丰富了人的认识形式，阐释了在认识的不同阶段非理性因素具有不同的作用。但非理性主义把非理性因素视为对人类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其错误在于片面强调非理性因素，否定理性因素，把非理性因素绝对化、客观化，把非理性作为支配人一切活动的“内驱力”和唯一思维方式。在认识的不同阶段非理性因素具有不同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认识的不同阶段，非理性就具有绝对的独立性。实际上，在人认识的各个阶段，或者说，在人认识的整个过程中，理性因素始终存在着。传统的社会发展观往往过分地倚重理性主义发展观或非理性主义发展观，因而在实践上

不可避免地产生种种偏颇。只有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理性与非理性本来就是人类思维的两个方面,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发展中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过分地崇拜理性和过分地崇拜非理性的发展观,都是片面的,都不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因此,理性主义发展观与非理性主义发展观的整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当然,在对待社会发展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问题上,还是要以理性为主导。毕竟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现代社会发展的出路不在于要不要摆脱理性,而在于如何建立合理的理性。合理的发展需要合理的理性指导,从社会发展合理性的角度来谈论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理性,并根据社会发展合理性的要求来重建理性,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出于这种考虑我选择了“合理发展与理性的重建”作为专著的题目。

选取“合理发展与理性的重建”作为专著的题目,也是长期思考的结果。20多年来,我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研究的问题很多,如发展的代价、发展模式、发展的评价尺度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中,自己较感兴趣的还是合理发展问题,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深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早在大学期间,我就对他的专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非常认真地读了他的这本著作,韦伯是古典社会学家中第一个以合理性概念为工具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本质的理论家。后来,又逐渐读了他的《学术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韦伯描述了合理性的种种表现,阐明了合理性的概念,以合理性概念为解剖刀,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地批判,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地反思。韦伯用合理性思想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我认为用合理性思想来看待当代的社会发展

同样也是有意义的。二是自己对合理发展问题比较感兴趣是出于对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这个问题的长期关注。公平与效率问题曾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紧密联系。从十四大报告的“兼顾公平与效率”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十七大报告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认识过程。从合理性的角度而言，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发展合理性问题。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如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行业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两极分化趋势的加剧等现象，既是公平与效率关系处理不好所导致的后果，也与制度不公正、不合理有着直接的内在关联。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的本质特征，也是人类社会具有永恒价值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准则。正如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开宗明义所说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sup>①</sup>。公正是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公平是社会分配领域的问题，首先要实现社会制度安排的公正，然后才能实现社会分配领域的公平。因此研究公平与效率问题离不开深入研究社会发展合理性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选题的缘由，有必要分析社会发展合理性问题的缘起。

## 第一节 发展合理性问题的缘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就一直成为社会的主题。不同的

① [美]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 [M]. 何怀宏, 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2.

国家和民族，为了谋求本国、本民族的发展，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国家与民族在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社会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这引起了人们对“什么样的发展是合理的，如何实现发展是合理的”等问题的关注与反思，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就是社会发展合理性问题。社会发展合理性问题之所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与当代社会整体上不断向现代化更高层次的迈进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与人类对自己生存危机的深切关注密不可分。事实上，人类社会要发展，必然存在一个向何处及如何实现发展、应向何处及应如何发展的问题，为此要对各种发展目标及实现每一目标的种种手段进行反思，探求其合理化限度并寻求合理化标准以指导具体发展问题的解决。这就是发展合理性问题，其实质是建构科学、合理的发展观问题，是对发展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对社会发展中的每个问题都可以追问其合理性，这些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什么是发展，二是如何实现发展。相应地发展合理性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什么样的发展是合理的，二是如何实现合理的发展。什么是发展和如何实现发展是基础的方面，先确定了合理的发展目标才能围绕此目标设计合理的发展手段，如果发展目标本身就是不合理的，那么发展手段的合理性也就无从谈起。合理性问题在现代、当代哲学中受到关注的原因及其意义，可以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去探寻。

### 一、从历史上看，这是旧理性哲学的崩溃与理性重建的结果

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理性主义，作为西方哲学发展源头的古希腊哲学开启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杰出代表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奠定了古希腊哲学甚至整个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传统。苏格拉底提出了“德性即知

识”的观点，强调要把握普遍的善并致力于寻求善的一般定义，他认为“善的一般”是一类事物的共相，而这种共相只有理性可以把握，苏格拉底将哲学引向了理性的道路。柏拉图把理性看作是灵魂的主宰，认为意志和情欲等非理性的东西只不过是灵魂的附属物。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人是逻各斯的动物”这一著名命题。近代时期被称为理性时代，笛卡尔和培根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分别代表了天赋理性和经验理性。在笛卡尔之后理性成了绝对至高无上的东西，宗教、法律制度在内的一切东西都必须服从理性。德国古典哲学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推向了顶峰。康德、费希特和谢林都主张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到黑格尔时，理性更是被抬高到无所不能的地步。在黑格尔看来，“‘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sup>①</sup>。绝对精神是理性的最高形式，它是宇宙的最高本体、世界的最终本原和灵魂，自然、人类和社会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和表现，黑格尔把理性贯彻到一切领域，把理性看作是无限权力和历史主宰，并由此导致了对理性的崇拜。

在理性主义者那里，理性就是世界的本原，是评价一切的绝对标准，而理性本身是不需评价的；理性可以批判一切，而理性本身则是非批判的、自明的。然而，人类实践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无情地打破了理性至上的迷梦，引发了对理性主义的批判。这就要求对理性本身进行科学反思和合理评价，正是在这样一个重新理解和合理评价理性的过程中，合理性问题凸显出来。合理性问题是在对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中提出来的，但合理性哲学的实质并不是对理性的简单否定，而是对绝对理性主义的抽象性、片面性、形而上学性的批判和否定，其目的在于消除理性的至高无上性和绝对性，恢复对理性的正确理解，使之回到其应有的合理地位。

① [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47。

## 二、从现实上看，这是对“现代化”关联下发展合理性批判的结果

“现代化”是个迄今远未能取得一致认识的概念，但一般来说，现代化是指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或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标志是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知识化、世俗化等。现代化也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是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起源于西欧并席卷世界的现代化浪潮，以汹涌澎湃之势走过了将近四个世纪的路程，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一方面，它在生产力、经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以至政治等领域，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进展，现代化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它又带来了众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能源与资源的巨大消耗，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偷盗、抢劫、杀人、放火、贩毒、吸毒等社会犯罪日益严重；随着商品交换的普遍发展，商品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的深重影响，社会生活以及人本身日益商品化、物化与异化，从而出现了人性扭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形等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以致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沟通受到影响。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物质财富的巨量增加与人在当代社会中的贬值，失落成为西方社会中最触目惊心的事实。当代人类实践及其结果的异化效应迫使人们在理论上进行深层次反思：当代实践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实践本质上是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世界的理性活动。如果说实践有问题，那一定是指导实践的理性本身有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社会发展合理性的内涵和实现进行了深入反思。

### 三、西方传统发展观面临的危机是社会发 展合理性问题被世人普遍关注的另一重要原因

以研究发展伦理学为专长的刘福森教授认为：西方传统发展观面临的危机是现代人类面临发展危机的主要根源。刘教授的主要观点是：西方传统发展观所讲的“发展”是一个包含着价值预设的概念，发展具有“方向”上的预设，发展的唯一确定的方向就是具有积极价值含义的方向，即“向上的”、“进步的”、“好的”方向。向着这个方向的变化就是发展，与此相反方向上的变化就是“反发展”，即“倒退”。既然发展本身就是包含着某种价值预设的概念，那么，发展本身就是“天然合理的”了。<sup>①</sup>

传统发展观是建立在“发展是天然合理的”这样一个哲学信念的前提之上的，缺乏发展的自我评价机制。在它看来，只要是发展就比不发展好，发展得快就比发展得慢好。因此，传统发展观只关注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对于“为了什么而发展”和“怎样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样一个目的论、价值论问题却毫不关心。其结果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说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sup>②</sup>西方传统发展观对价值的迷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发展的“价值危机”：只要发展得快，无论人们用何种方式去对待自然界都是“应当”的，都是合理的，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人们为了谋求发展，使出浑身解数，不惜一切代价，这种发展是以牺牲自然整体的稳定平衡为代价的发展，是一种以牺牲人的健康生存为代价的发展。这

① 刘福森：《发展合理性的追寻——发展伦理学的理论实质与价值》[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30。

② [美]威利斯·哈曼：《未来启示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93。

是一种不合理的发展,因为它导致现代人类面临严重的发展危机,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人类面临困境之时,人类不得不进行反思: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合理的?合理发展的模式和道路是什么样的?正是由于对西方传统发展观所面临的危机进行深刻反思后,社会发展合理性问题才日益突出。

#### 四、人文社会科学的崛起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统一,这是社会发展合理性问题得到普遍关注的又一原因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曾经预见:“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sup>①</sup> 20世纪以后,科学发展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不断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预言。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崛起是20世纪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出现了并驾齐驱的局面,大量综合学科和交叉学科出现,证明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如果说19世纪的哲学理论还主要地以概括总结自然科学发展成就来促进自身发展的话,那么,在当代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完善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差异很大。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界的客体和现象,是经验事实,其直接目的在于求真,其知识的形式主要是“事实判断”。社会科学则不同,其直接研究对象是人的社会存在、社会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由于所有这些认识和研究都必然要涉及人的生存及需要,所以社会科学不仅是对事实的认识,同时也是一种对价值的认识,其知识的形式主要是“价值判断”。此外,人文社会科学要求承认社会历史事件的独

① [德]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0.

特性，真实地再现社会历史事件，必然要求阐释包含在独特的社会历史事件中的价值因素和人文意义，因而必须诉诸“理解”。面对迥然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如何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在理性意义上实现二者的统一，这是合理性受到当代人瞩目的重要缘由。

### **五、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国家社会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的不断推进是合理性问题普遍受人关注的主要原因**

在我国，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程度的逐渐提高和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的不断推进，发展合理性问题也日益凸显。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基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和争议，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已注意到发展合理性问题，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科学论断，在总体上勾勒出了当时及以后的发展合理性标准问题，及时而进一步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改革开放深入而正确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且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实践的不断推进，发展合理性已逐渐成为中国发展理论及实践的核心问题，这种核心的地位，首先，由于我国急切寻求高效快速的发展所致。目前中国的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怎样在现实国情和国际环境中寻求快速、高效、持续和稳定的发展，寻求跨越式的追赶型发展，寻求能体现制度优越性的发展。它决定着当今中国发展的方向、性质和道路，决定着发展的步骤、模式和机制，决定着发展价值的认可。其次，发展合理性的核心地位还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和性质所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固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我们的发展围绕之进行，合理性亦围绕之判别。不难理解，发展的合理性

成为了发展的关键问题，亦是中国发展哲学的核心问题。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但对于“发展”内涵的认识是在不断演进变化的。发展观所说的“发展”与作为日常用语和哲学范畴的发展，既有词义上的渊源关系，又在内涵和外延上具有实质性的区别。即使是在发展观的研究中，人们对发展一词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发展是一个多义词，由于对发展的含义理解不同，在对发展的合理性评价上有很大的分歧。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先搞清楚发展的科学内涵。

### 一、发展的概念

从词源上看，发展的本来意义源自近代生物学胚胎发育学说，指的是生物胚胎“自然而然”的演变过程。后来，遗传学家把“发展”解释为事物渐进过程的“中断”，即事物由旧的形态“飞跃”到新的形态。

实际上，在唯物辩证法中，运动、变化、发展是同一序列、彼此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三个范畴。运动，作为物质存在的方式，是一般的变化。宇宙间发生的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变化、生命过程、社会发展以至思维活动等一切变化和过程无不是物质运动的形态。变化既包括事物量的变化，也包括事物质的变化。它可以是上升的、前进的运动，也可以是下降的、倒退的运动。发展则是变化的高级形式，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衰亡，是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前进和上升。变化都是运动，但有的运动不是变化；所有发展都是变化，但有的变化不是发展。这是这三个范畴最主要的区别。从哲学上

看，发展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运动变化过程，也就是事物内部矛盾不断产生、发展和解决的过程。发展，是前进和变化的概念。发展是一个前进性的上升的运动过程，作为具体过程，发展是历史的、有条件的，是同一社会历史条件、经济状况、伦理道德及社会制度等协调一致、联系统一的，考察社会发展问题应当考虑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经济状况、伦理道德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发展，是前进和变化的概念，发展是个历史范畴，是随着历史进程而变化的。在国际上，“发展”是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产生的专门术语。开始时，“发展”主要是作为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来使用，其含义始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研究。1956年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成为了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刘易斯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认为发展就是指“总人口人均产出的增长”。7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三种对发展的不同解释。一是把发展看作是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广泛的社会变革过程。如著名的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曾将发展定义为“全部社会体系的向上运动”。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泛的方面。因此，应该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sup>①</sup>二是把发展看成是可持续的发展。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提出了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的观点。三是认为发展应坚持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强调人的发展重于物的发展，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如D. Goulet就认为：“发展”包含着三种核心价值——生存、

① [美] 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50。